

#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体系与核心\*

——评郭英德教授《探寻中国趣味》

李小龙

**【提要】**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于很长一段时间中，在“技”的层面尚称繁荣，但在“道”的层面却面临着巨大的困境。解决这一困境，不仅要重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逻辑体系，更要深入地追问这一研究的意义何在。郭英德教授的新著《探寻中国趣味——中国古代文学之历史文化思考》分别在文本的厚度、心理的深度、历史的广度和学理的精度四个层面，建构出四位一体的完整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体系，并以“中国趣味”四字来标举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正可作为解决这一困境的最佳例证。

**【关键词】**古代文学研究 体系 郭英德 中国趣味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952(2018)02-0098-10

中国古代文学有着辉煌的历史，但它（或者至少关于它的研究）是否还可能有辉煌的未来呢？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传统社会形态土崩瓦解。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古代文学也逐渐被塑形为与当下隔绝的“古典”。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古代文学研究者常会面对一种质疑，即它们多与抱残守阙、固步自封之类的判断相联系，而这亦对相关的研究者形成大语境的挤压与渗透。这种社会文化惯性对古代文学研究最大的损害在于：不少研究者无法标定自己工作的意义，即很难理直气壮地回答“为什么”的价值追问；而其对意义的模糊乃至虚无于研究而言，更是一种釜底抽薪式的摧陷。易言之，不能在“道”的层面很好地回答“为什么”的研究者，在“技”的层面也无法真正解决“怎么做”的问题。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一直面临着纷繁的困扰。穿透表层的迷雾，我们会看到，由“道”之“罔”到“技”之“殆”或许才是最大的隐忧。

对于这一隐忧，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者并未放弃思考，对“道”与“技”的反思与建构也一直影响着研究的立场、取径与成效。在这些筚路蓝缕的前行者中，很多学者的研究塑造着我们当下的研究底色，郭英德教授就是其中一位。三十余年来，他的研究一直在追问着这些最深层的问题，纵观他的学术道路，可以看到他既敢拈大题目，又绝不忽视文本细节；既有西方理论的架构能力与穿透力，又始终对中国传统抱有敬意与温情。他的反思与建构更为当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擘画体系、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14ZDB066）的阶段性成果。

提供范例并标示境界。所以，深细地梳理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或许会让我们对此有更自觉清醒的认识。

郭英德教授从一开始就有着宏阔的视野与博大的气象：最初的研究便在元代社会、文人、宗教、西方戏剧的关连中展现出古代文学更丰富的向度；<sup>①</sup>《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一书，<sup>②</sup>“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作了一个全面的回顾，将历代文学研究活动的特征、方式及其成果作了一番历史的总结”；<sup>③</sup>《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显示出作者试图建构中国古代文体学史论的气概以及相应的实绩，<sup>④</sup>《中国古代文学与教育之关系研究》，将文学研究与教育结合起来，以民族精神的养成为核心，深入研究了中国古代文学教育自身的特点及其与历代文学的生成、发展及传播之间的密切关系；<sup>⑤</sup>考虑到散文在中华传统文化传承方面的核心地位与中国古代散文研究零散薄弱现状之间的矛盾，郭英德教授毅然放下手中正在进行的几项学术研究，承担起散文研究的艰巨任务。2013年，他与郭预衡先生共同任主编的《中国散文通史》出版，<sup>⑥</sup>以十二卷四百余万字的篇幅，构建中国散文谱系，贯通古代、现代和当代，深入、全面而系统地呈现中国古今散文演变的历史。

总而言之，正如党圣元先生在一篇书评中所云：“郭英德每次学术领域的转移，都给学术界奉献出自己具有显明的原创性的学术成果”。<sup>⑦</sup>通过以上梳理，我们亦可看到郭英德教授三十余年来的学术路径。当然，以上内容只关注了郭英德教授出版的专著，还不能更细致精微地体现他在“道”的层面上的建构与反思、在“技”的层面上的实绩与示范——这一任务，需要一部精心编选的论文集来呈现。《探寻中国趣味——中国古代文学之历史文化思考》（以下简称《探寻》）一书的出版恰逢其时，<sup>⑧</sup>此书被商务印书馆纳入“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之中。此丛书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交相辉映，向世界展示中华学人立足本土、独立思考的思想结晶与学术智慧。郭英德教授此书入选，从某种意义上也标示了学术界对他原创性学术成果的认可。

《探寻》一书依次分为“文学史学”、“文学史论”、“文人心态”、“文体研究”四个部分，也即学理的向度、历史的向度、心理的向度、文本的向度，这正是作者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构建的理论框架。这一框架的次序符合“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文心雕龙·知音》）的认知规律。但是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学习者，我们更希望从“知音”的角度看到“缀文者情动而辞发”（《文心雕龙·知音》）的研究轨辙。因此，本文以从具体到抽象、由微观到宏观的逆向顺序，来对此框架及其相关论文进行评述，以便更深入地认识这一体系建构的学理逻辑。

## 一、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立足点——文本与文体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之所以存在，正因为有大量的文学文本传世。其研究都应该以文本为基础，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虽然据下文所论，这一研究体系并不只限于文本，还要进入作家心态与历史风貌的领域，从而将文本放在合理的背景下去阐释，但这不能否定文本的基础地位。也就是说，

① 参见郭英德：《元杂剧与元代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明清文人传奇研究》，（台）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世俗的祭礼——中国戏曲的宗教精神》，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优孟衣冠与酒神祭祀——中西戏剧文化比较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② 郭英德、谢思炜、尚学锋、于翠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

③ 蒋寅：《由学术史回眸我们拥有的传统》，《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第204页。

④ 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⑤ 郭英德：《中国古代文学与教育之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⑥ 郭预衡、郭英德总主编：《中国散文通史》，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⑦ 党圣元：《评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第207页。

⑧ 郭英德：《探寻中国趣味——中国古代文学之历史文化思考》，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按：以下述评仅标明书内篇目，不另注。

文本研究有其独立性，不是理论的图解与概念的举证。

郭英德教授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一直以文本为立足点。《探寻》的第四组共九篇文章均属于这一部分，也是比重最大的部分。这组文章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郭英德教授一直以来最为关注的“叙事”研究；第二类属于文体研究；而第三类则属于文体研究的理论建构。

叙事是戏曲与小说最核心的质素，先秦儒家的叙事观念又是中国传统叙事的源头。正如作者在《论先秦儒家的叙事观念》（1998年）一文中所指出的，中国叙事之本体实源自“实录”。从这一特点出发，作者挖掘出中国叙事传统的政治或道德功能，即所谓的“春秋笔法”。这一判断是从中国叙事传统中抽象出来的，其对叙事之研究尤其是对深受西方叙事学影响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如果我们接受这一从中国文化出发而寻绎出来的自己的叙事传统，那么，中国小说的研究究竟要削足适履地按照西方叙事学的理论要求去切割，还是重回我们自己的视域来，就成为研究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和小说时，人们往往会陷于迷惑之中，因中国人将二者视为一体，甚至近代学者也多不作区分。当下研究对此多有指摘，实际上或许仍是西方文学观的体现。《叙事性：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双向渗透》（1995年）一文即指出，西方的文学艺术分类传统遵循“辨同求异”的基本思路，而中国则受到“求同存异”的思维方式的制约，并进而指出，戏曲、小说、说唱文学三者是同源异流的，叙事性是它们共同的血缘纽带。在此指引下，作者详尽分述了中国传统叙事中叙事时间的直线式、叙事视角的全知式特征。深受启发的是，作者由此指出，西方古典戏剧的表演时间与故事时间大体一致，而中国古典戏曲则不同，这决定了中西方戏曲叙事中“回顾式”戏剧结构与顺叙的不同；在叙事视角上，作者指出了戏曲因文体特征的原因，多为限知叙事，但仍有从限知到全知的转移；再就叙事语言来说，西方理论认为，小说为叙事体，而戏剧为代言体，但中国的小说与戏曲却互相渗透。作者进一步指出这种叙事性的审美内涵即整体美、自然美、综合美、通俗美，亦极有启发意义。此外，角色与雷同人物形象的研究，也都是作者在对中国传统叙事智慧认识下所展开的深细讨论。而《论古代戏曲文学的文体特性》（1989年）与《明清传奇戏曲叙事结构的演化》（2004年）两篇文章其实也是如此。这些文章均是从前述对先秦叙事观念的梳理中生发而来的。

在对小说、戏曲的关注之外，郭英德教授近年来将学术重点转移到了古代散文领域。这既是出于对古代文学研究格局不平衡状况的担忧，也体现出其在发扬中华传统文化方面的使命担当。因此，郭英德教授不仅承担了“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这样基础性的文献工程，而且创办了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专业学术刊物《斯文》，希望“搭建一个好的学术平台”，“积极推进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深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阐发其中蕴藏的哲学思想、伦理观念、价值追求和审美精神”。<sup>①</sup>这些工作既扎扎实实地推进着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基础清理”，也引领着散文研究的“顶层设计”。而在文体研究方面，《探寻》也有相应的体现，即收入了《论明人传状文的文体特性与文化内涵》（2007年）、《论明代论辨文的时代特征》（2010年）两篇文章。前者将明代传状文放在传状文的发展历史中观照，描述出明代传状文传主身份的平民化、传主事迹的奇异化和表现方式的主体性特征，并深入论述这些特征背后的文化内涵；而后者揭示出明代论辨文研精一理而师心独见的主体性、锋颖精密而是非明辨的思辨性、理与气偕而辞共意并的感染性的时代特征。前云《中国散文通史》特别注重文体，由此二文，亦可窥豹一斑。

<sup>①</sup> 郭英德主编：《斯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发刊词》第2页。

本组文章中，最为重要的是第一篇《中国古代文体形态学论略》（2001年）。中国古代文学非常关注文体，所以才会有“文章以体制为先”的判断。文学研究其实最终都要落实到文体上，但由于各种原因尤其是西方文学观念的冲击，长时间以来，国内学界在文体研究上都较为薄弱，甚至将文体研究视为形式主义而予以摒弃。近年来，学界终于意识到忽视文体的探讨对文学研究所造成的损害，开始从文体的视角重新审视古代的文学现象。不过，文体研究之“坠绪”却并不容易就此接续，因为一方面文体研究本就需深入精微的探讨，较之主题、思想、形象、艺术手法四驾马车的套路则更显其难；另一方面其也缺少理论的建设与范式的引导——而《中国古代文体形态学论略》一文在文学方面的开拓则恰恰补足了这个短板。

在文体学的理论设计方面，此文从古代文体学理论的实际出发，遵循古人引喻设譬的思维逻辑，从学理层面为文体研究确定了从体制、语体到体式、体性的四个层次。这四个层次由表及里、由具体到抽象，是可以清晰把握同时又融为一体的，为古代诸种文体形态的研究提供了易于操作的理论框架。这篇文章与收录此文的《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一书，在近些年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中具有很高的引用率。可以说，这一框架得到了学界的认可。

这一理论框架之所以产生强大的生命力，原因有二。

首先是理论来源的同构性。任何理论框架，都是为解决问题服务的，那么，“理论”就必须与“问题”有共同的思维逻辑，否则，嫁接的理论虽眼花缭乱却治丝益棼。郭英德教授的文体理论，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把艺术形式拟人化的传统出发，指出其论“文”称“体”，便是用人体来类比文章结构的总貌，以为文体与人体有相似甚至相通之处，基于这一古人的认识，辅以历来文评家的论述，从中抽象出文体理论的四个层次。也就是说，这一理论成果本来就是从古代文化逻辑中抽象出来的，因而其再反过来被用于研究中国古代诸种文体的问题，自然势如破竹。

其次是理论层次的清晰性。因为理论框架事实上是研究者的一种虚拟框架，所以最忌含混或层次淆乱。好的理论框架即使在人文社科领域，也应该有数理科学定理的简洁优美，比如陈垣先生在校勘学上提出的校勘四法就是一个佳例。郭英德教授所界定的文体研究四层次也是如此。认识一种文体，也仿佛认识一个人，首先接触其外在的形状、面貌、构架等体制特征，其次接触其语言谈吐等语体特色，再次熟悉其体态动作等体式表现，最后感受到心灵与性格等体性精神。四者由外至内，各负其责，同时又逐步递进，共同表现出一种文体的全貌。

总之，从郭英德教授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文本研究尤其是其中的文体研究，仍然是当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任何一处研究上的突破，都要从面对文本开始。

## 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两翼之一——作家心态

文本是研究者与作者沟通的桥梁。当然，我们要充分理解“桥梁”一词的意义。也就是说，阅读或研究文本，更重要的是通过文本获得意义。不过，对文本意义的追寻仍有一个不可忽略的中间环节，那就是作家的心态。因为文本是作家创作的，研究作家的心态，其实正是在追索文本的“初心”。郭英德教授也指出对于文本的研究是借助于现存的文学文本，发掘并重建古人的心灵世界，进而深入地审视古人的文化心态。因此，本组文章正是希望通过对作家心态的抉隐索微，从而获得对文本进行深度诠释的可能。本组文章也可以分为三类，即文人个体的心态揭示、文人心态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及从教育角度研究文人心态的生成。

在文人心态的揭示部分中，《蒲松龄文化心态发微》（1990年）一文有着重要的意义。《聊斋志

异》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皇皇巨著，在小说一体中，一直被认为是“七大杰作”之一。但不可否认的是，对它的研究却一直无法深入，与对明代四大奇书等都无法相比。其原因多在于若想对此书展开深入讨论，就会陷入一个悖论，即深入研究要求统一而有机的理论框架，但《聊斋志异》作为一部文言小说集却无法提供这样的框架。理论建构能力强的学者自然可以强行切削而搭建，却也无法避免切削带来的削足适履的弊端；但若放弃整体观照，各自为政，又无法以整体的力量呈现此书的价值和意义——事实上，这也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带有普遍性的理论难题。这当然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呈现方式有关。郭英德教授此文给该难题带来一种解决的可能性，那就是从蒲松龄的文化心态入手，来构建整体观照的学理基础。基于此，作者指出蒲松龄“人生大半不如意”的科举心态，并将其对科举的态度与顾炎武、吴敬梓作对比，从而揭示出《聊斋志异》中有关科举的篇目的阐释向度；从“翠绕珠围索解人”的理想追求出发，则蒲氏笔下多写美丽之女性，作者一方面承认此为补偿心理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指出此实为香草美人传统的接续；作者从“缘来缘去信亦疑”的宗教意识指出，蒲松龄的宗教意识不过是汲取象征性的宗教信仰、理想性的宗教情感和超越性的宗教思维而已。这些层面的阐释不但在很大程度上为《聊斋志异》的研究奠定基础，更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其他研究产生启发意义。比如《关汉卿杂剧的文化意蕴》（1989年）一文即又一例证。关汉卿《窦娥冤》一剧最为有名，王国维曾评其“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但由于此剧极易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解读，于是，在很长的时间里，它便被简化为阶级迫害的图解。研究者似乎忘了王国维此语前还有“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的评析。<sup>①</sup> 本文指出，《窦娥冤》的冲突有三个层面，其中的社会冲突是最浅层次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还带有偶然性，作为解读此剧的核心逻辑显然并不具有普适性。而且，其实质毋宁说是道德与非道德的冲突。此后，作者更进一步指出了道德冲突的内化与深化的第三个层次，那就是意志冲突，即不安于现状与不得不安于现状的冲突，不信天地鬼神与不得不信天地鬼神的冲突，明知道德无用与不得不遵从道德的冲突。这一解读将王国维的评价细化、深化，实际上也更指向了中华文化的道德内化传统。作者再将此解读移至关汉卿的其他杂剧，自有势如破竹之效。《论汤显祖文化意识的悲剧冲突》（1987年）亦与此类似，该文指出极力寻求社会和人生的出路而终究无路可走的两难心理和汲汲不息地探索追求却终究归于失败的悲剧精神，是汤显祖的文化意识的基本内核，也是其价值所在。这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汤显祖的文化意识，从而触摸到临川传奇的悲剧情蕴。

当然，正因为文人心态是文本与社会、历史意义之间的环节，所以，对文人心态的梳理也必然包含社会的维度。《“守之俟来哲”：顾炎武的遗民心态》（1999年）与《黄宗羲的人生定位与文化选择——以清康熙年间为中心》（2002年）两篇文章即是这一思路的范例。前文是一篇皇皇大作，不仅在于长近六万言的篇幅，更在于视野的宏阔与识见的超拔。作者将顾炎武这样的一代大儒放回到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还原出顾氏在改朝换代的历史情境中的遗民心态，从而梳理出顾氏心态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正如作者所论，著书立说，以待后王，这种坚定不移的文化行为方式，决定了顾炎武的人生价值不是取荣当代，而是扬名后世。而对于与顾炎武既相似又相异的黄宗羲，作者也同样在细致梳理中标定出他的人生定位和文化选择。

如果我们通过文本来梳理作家的心态，并通过文人心态的把握向内指向作品，向外指向社会，那么，我们也会理所当然地追问，作家的文化心态是如何养成的？《论剧作家李渔的文学教育》

<sup>①</sup>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9页。

(2010年)一文就是解答这一追问的例证。此文原为作者《中国古代文学与教育之关系研究》中的一章。“文学教育，指的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经由文学文本的阅读、讲解与接受，丰富情感体验，获得审美愉快，培养语文能力，进而传授人文知识、提高文化素养、陶冶精神情操的一种教育行为”。<sup>①</sup>可以看出，这一概念的提出与梳理已经进入教育、社会的领域，既是对儒家“游于艺”的教育理念的重申，又是对西方公民素质养成观念的回应。不过，我们都应该承认，由于教育尤其是文学教育难于在量化角度进行观测与评价，所以这一课题虽然非常重要，但也充满困难。郭英德教授在这篇文章中作了非常好的示范。作者从李渔的文学教育与知识结构、创新精神出发进行深入论述，勾稽相关资料，令人信服地指出李渔之所以如此，实有文学教育上的渊源。不过，作者也并不讳言关于文学艺术创作才能，究竟是本于先天还是得之后天的质疑。这或许永远没有答案，但就李渔而言，作者认为他从小所接受的文学教育与他的戏曲文学创作之间的因缘关系，仍然是有迹可循的，探讨一位剧作家文学教育的实际状况，可以更清晰、更全面地了解剧作家艺术道路的选择、创作个性的来源和艺术风格的形成。这其实也是中国传统文学最为关注的地方。

应该说，作家心态研究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有其逻辑上的暗合之处，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有“知人论世”之传统（作者亦有专文梳理此论，参下文，可知以此为理论基点并非巧合）。作家之写作行为自然也被纳入这一传统之中，因此，作家心态与文本之关系较之西方要紧密、复杂得多。而中国古代文学的文本呈现又非出之以西方的“有机”面貌，故其研究之涉足作家心态，并非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而是必不可少的雪中之炭。

### 三、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两翼之二——历史风貌

作家心态的研究是向作家一端寻求解密文本的思路。事实上，一个文本必然连接着两端，一端是作家，另一端则是社会历史。所以，对历史风貌的描摹、还原也是我们研究的重要任务。这一任务既与前述“知人论世”之传统有关，亦与史官文化的影响有关。

郭英德教授指出，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为形象而直接地触摸历史的脉搏，也可以帮助我们更为透彻地认识中国文化的真谛。也就是说，由文本而至文人心态，还未能探骊得珠，还要再由心态入于历史，方能得到更多深广的理解。

《探寻》的第二组文章即属于文学史论的范畴。以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来看可依次分为三类：即从历史梳理来考察文学风貌，由文学探寻历史以及文学与历史的相互作用。

《光风霁月：宋型文学的审美风貌》（2003年）与《向后倒退的革新——论明末清初的求实文学观念》（1996年）两篇文章都是第一类从历史梳理来考察文学风貌的佳作。前文从文官政治与士人风范、三教融通与理性精神及文化普及与游宴享乐的历史语境出发，深入讨论了宏观历史语境如何沉积于宋代文学的审美风貌之中，并精辟地指出，宋型文学具有鲜明的政治化和道德化色彩，也富于思辨精神和超越精神，并且洋溢着浓郁的书卷气和学问气，从而形成了宋型文学“光风霁月”的基本审美风貌。后文的题目十分有趣，既梳理了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问题，即明末清初求实文学观念纠正了明代拟古的隔膜与性灵的逃避，因此成为一种文学观念的革新；又指出这种革新实质却是倒退回传统之中的。而且，这一矛盾在清代仍有继响。主情文学虽稍有回归，如袁枚再次扬起性灵大旗，曹雪芹以“情”结构作品，但总体来说，倒退的步调却明显加快，传统意识全面复归。可以说，

<sup>①</sup> 郭英德：《中国古代文学与教育之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这为我们显现出近数百年中国文学发展中最根本的矛盾。此类研究既要有对历史语境清晰的把握，又要能精准地将其落实于文学风貌的描述之中，其实是最难的研究。因为无论是对历史语境还是文学风貌的把握，都非常需要功力，而尤要者又在于两者全无枘凿的对接。以此来看，此二文足可称为相关研究的典范。

第二类则以文学为基点，再将文学的触角伸进社会层面中去。其中，《论晚明清初才子佳人戏曲小说的审美趣味》（1987年）是本书所收撰写时间最早的文章，但已能显示出作者驾驭宏大命题的功力。才子佳人小说戏曲因时代不同、作者不同，甚至文体也不同，但作者认为当我们将它当作一个文学现象放在文学史发展的长河中做整体的、宏观的研究时，我们完全可以采取求同存异的方法，发掘其由一定时代、一定社会、一定阶级的审美理想所决定的共同的审美趣味——即理想人格结构及爱情婚姻主题。更重要的是，作者的目的并不在此，因为这无法解决晚明清初时期对此类作品截然不同的审美评价。作者指出，这种审美趣味的实质，揭示了这种近代审美理想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所能达到的极致，以及知识阶层对近代审美理想的追求终究无法超越古代意识与近代意识的临界状态，以及不可避免地复归封建文化传统的必然归宿。此外，《黄宗羲明文总集的编纂与流传——兼论清前期编选明代诗文总集的文化意义》（2000年）一文，一方面从文献的角度对黄宗羲所编明文总集进行梳理，另一方面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指出清前期编选明代诗文总集的历史意识和历史价值。这种研究正为作者擅长之领域，即由对文学“趣味”的探讨进入对历史的感知。

第三类则由文学与历史的相互关系来探究二者互动的机制与肌理。《明清文学教育与戏曲文学的生成》（2008年）探讨的是，明清时期文人从社会环境中所得到的文学教育如何成为戏曲文学的营养。如前所言，这是难以讨论的一个话题。但作者非常擅长搭建合理的理论框架，从而将问题引入可以讨论的层面。此文便将戏曲文学划分为三个层面，即本体、建构与载体，再分别从文学知识、文学思维与文学表达三部分的文学教育内容来对应这三个层面，从而形成完整的论说结构。《元明的文学传播与文学接受》（1999年）一文同样如此，即文学传播与文学接受也是难于论述的。作者则将文学传播分为三种类型，即书籍的借阅和传抄，书籍的抄刻和买卖，戏剧的演出和说书活动，也即人际传播、商业传播和娱乐传播三个层面，在各个层面再细述其传播与接受的样貌，从而将复杂的问题清晰地显现出来。

《传奇戏曲的兴起与文化权力的下移》（1997年）一文更是一篇带有典型郭式风格的宏文，即一方面有大气象，敢于下大判断；另一方面却不蹈空而论，而是注重文献与历史细节。作者指出明成化至万历年间文人自我意识的高涨与主体精神的张扬，促成了文化权力由贵族至文人的下移趋势。这种下移的历史大势也选择了南曲戏文来重建新的文化传统。文章不但严密论证了文化权力下移与传奇戏曲的兴起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从传奇戏曲的梳理进入了历史文化的疆域，为晚明文化变迁的大势提供了清晰的学理支持。事实上，由此文开始，“文化权力下移”成为晚明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判断，也成为试解晚明历史文化研究之灵钥。

在古代文学研究这一翼中，有一种倾向值得反思，即学界颇有对古代文学研究者“为史学打工”的担忧。抛开具体语境，抽象探讨此论，笔者是不敢苟同的。这一担忧若置于西方文学研究中，似尚可成立，而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实为伪命题。因为中国古代原无纯文学传统，今所视之文学作品，均难与历史剥离，所以，对其之研究本来就当有历史的潜台词。我们当下的研究已经按西方文化传统强分畛域了，如果在研究方法上再切断文史之间本来丰茂的联系，则我们研究的格局与境界将日渐萎缩。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 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文学史学

以上三组文章分别从文本的厚度、心理的深度和历史的广度来探讨中国古代文学的不同向度，这都是以文学为对象的研究。事实上，我们还须对文学研究进行关注，建构起精密的学理体系，来指导中国古代文学以文本、心理和历史为向度的研究。

郭英德教授是学界自觉反思文学史学的学者之一，本书的第一组文章即属于此范畴。这组文章也同样可以分为三类，即以具体研究升华至理论建构、宏观的理论阐释以及借助他者而彰显本体意义的文章。

第一类文章有三篇。《“知人论世”的古典范式与现代转型》（1997年、1998年）是一篇有着重要理论意义与方法论意义的文章。<sup>①</sup>一方面，文章认为，“知人论世”强调作品与作者及社会的联系和一致性，并要求读者在这种联系与一致性中阅读和理解作品。另一方面，文章还进一步指出，孟子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文学阐释、文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从而形成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而最关键的是，本文对这一传统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并运用当下的理论视角，对其进行了学理重构，这当然是非常有价值的。而更有意义的是，这种梳理与重构的思路实际上又有着普泛的意义——比如本组中《关于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思考》（1992年）一文即提出了与“知人论世”并列的“大文学”观念、“述而不作”、“疏不破注，注不破传”、政治教化、直观领悟等古典文学学术史的特点。《论明代的文学流派研究》（1996年）一文与此相类似，看似是具体的文学现象研究。其实作者希望以此文为例，总结文学流派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刍议》（2005年）同样是一篇在具体问题与方法论意义上都有重要贡献的佳作。此文的意义呈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作者对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纷纭繁杂的版本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指出在通俗小说版本领域存在着“一书各本”的现象，不但发人深省地提出“主要作者”与“次要作者”的概念，还独具洞见地指出，恢复所谓一书的文本“原貌”，人为地制造一种“四不像”的版本，这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之大忌。另一方面，作者进一步指出，从消极角度来看，我们几乎不可能恢复一部通俗文本的“原貌”，而只能尽可能恢复一部通俗小说的不同版本或不同版本系统的“原貌”，但从积极角度看，却更可因此明白，一部通俗小说不同版本或不同版本系统对正文文字内容的不同处理，不仅有其各自的合理性，而且也有其各自的价值。所以，我们对版本的技术性研究却因眼界的放开而获得了动态地考察通俗小说的历史存在方式和历史发展进程的角度。事实上，此文对我们的启示还有更丰富的维度。比如说，传统文献学认为，“考镜源流”与“是正文字”是版本学研究的核心，但实际上这虽在传统四部文献上来看是正确的，在通俗小说的研究上却不免方枘圆凿。所以此文不仅开通了通俗小说在版本研究上的路径与可能性，更启发了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不同层次的深入思考。其实，在此文之后，笔者还想再讨论一篇没有被选入《探寻》的文章，即《悬置名著——明清小说史思辨录》（1999年）。<sup>②</sup>此文为明清小说史研究的范式转换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事实上，这篇文章的主题直到现在，都仍是古代小说研究中的一个屡被提及的学术话题。虽然偶有学者从批评的角度论及，但阅读此类意见时会发现，发表意见者或许没有阅读此文或没有细思“悬置”二字的意义，便对此文所引领的学术命题作片面的标签式理

<sup>①</sup> 此文共八节，前四节以《论“知人论世”的古典范式》为题，刊于《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后四节以《论“知人论世”古典范式的现代转型》为题，刊于《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第3期）。

<sup>②</sup> 郭英德：《悬置名著——明清小说史思辨录》，《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第61~66页。



解,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述评。这自然是不妥当的。梳理近十几年的明清小说研究,可以说此文发表之后,小说史上一些被忽略的细节得到了凸显,而细化与充实反过来也对名著的研究有了积极的推动。这不能不说与郭英德教授当年倡议“悬置名著”有关。虽然现在小说史被遮蔽的细节经过数十年的发覆,已经被勾勒得较为清楚,此时的研究又要稍稍回归到名著的范式中去——这或许也是《探寻》未录此文的原因。但不得不说,“悬置”其实是一种姿态。一个清醒的研究者,自然要时刻保持这样的学术警惕——因为在下一个学术进阶上,我们或许仍然要再次将名著悬置起来。所以,此文在方法论上的意义是永远有效的。

第二类文章有两篇。《关于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思考》(1992年)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的《绪论》,也是架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的基本理论框架。文章涉及极广,不但指出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诸多特点,更重要的是,指出了这些特点都是在彰显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与西方文学研究大异其趣的民族文化精神和艺术思维方式。而这种彰显也有着痛切的潜台词,即在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触目皆是西方文学研究的体系、思想、概念和方法。作者当然承认,我们应该积极引进西方的思想、观念和方法,但提出我们首先要认识自己,也就是探索和总结历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成果,深入了解其特色,然后才有可能在更高层次上与他国进行文化交流。而这实际已经不只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困境了。

《论文学史叙述的原则、对象和方法——以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撰写为中心》(2002年)一文对文学史叙述进行了理论的梳理。文学史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研究与传授的核心,虽然这一学科的建立与运行有其明显的缺陷,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此文精彩纷呈,新见叠出。如论文学史的叙述原则,指出文学史作为历史,具有三重含义:客观的历史事实,主观的历史认识与历史理解,以及表述历史的话语和文本;进而提出文学史也有三种存在方式,即文学史本源、文学史理解和文学史叙述。这就为所有文学史写作者、阅读者提出了一个互相关联的系统。即文学史首先是一种原生态的历史,是无法变更的、亘古永存的独立存在。其次,我们还要看到,这种本源又是无法复原的,所以,文学史就只能是一些局部历史的并置。再次,即使是这种被选择过的文学史,也存在一个叙述对象的问题。作者指出,中国的古代文学史写作,受到中国古代纪传体史书和传统目录学的深远影响,大多取作家本位。这种写作模式的实质是以求真复原为叙述原则的,与前述原则相悖,故当取作品本位。这些看法都既朴实又深中肯綮。

此外,郭英德教授对它山之石亦颇重视,因为这种研究常常给“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研究者意外的启发。《探寻》所收《“中国趣味”与北美地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2010年)一文就呈现了作者对“他者”的研究进程、方法与价值的关注。这种关注看上去似乎只是西方研究的述评,其实却贯穿着作者对中国趣味的探寻——尤其是在不同文化传统的观照下,这种探寻就更有意义。

## 五、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道”——探寻中国趣味

以上四节从郭英德教授四位一体的建构出发,来讨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体系。当然,这更多的是属于“技”的层面——虽然这些文章其实都有“道”的贯注,但由于我们讨论时更关注其在体系建构上的意义而没有抉出文中之“道”。所以,笔者想继续以郭英德教授的短文《文学传统的价值与意义》为例,<sup>①</sup>来讨论他在古代文学研究“道”的层面的思考。此文并不长,但对于当下的中国古

<sup>①</sup> 郭英德:《文学传统的价值与意义》,《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第1期,第16~17页。

代文学研究而言，却应被视为一篇具有纲领意义的文献。因为作者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命题——作者认为，正如西方文学思想是一整套体系一样，中国的文学思想也同样是一套完整的体系。只是我们在阐释这一体系时，不得不借鉴西方体系的逻辑与话语，从而使自身处于失语的境地。因此，作者更进一步地指出，这种困境并非传统文化的困境，而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与研究者的困境。我们该如何应对这样的困境呢？作者认为，在“技”的层面，我们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进入现代语境，但在“道”的层面，我们仍要关注中华传统文化作为维系中国人精神的重要意义。所以，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走向，不是简单地汲取古代文学思想的精华，也不是简单地继承古代文学思想或宏扬古代文学思想，而是能动地选择和激活古代文学思想，从而积极地参与现代文学理念的建构，并且不断地重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思想传统。其实，这篇文章已经说出了郭英德教授所秉持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之“道”——也是他在《探寻》一书的书名中所揭示出来的“中国趣味”。这才应该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纷纭万象之中的核心！

无论我们的研究是宏观的文学史学的建构还是文学史论的阐发，是文人心态的揭示还是文体肌理的缕析，其共同的潜台词都应该甚至必须是对中国趣味的探寻。因为一切古代文学的作品，都是中国趣味在不同层面上的艺术化表达。然而，不得不说，我们的研究还少有这样清醒的自觉，其上者以精深的研究暗自印证了这种中国趣味，而其中者或以“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基点来遮蔽研究的基础。所以，郭英德教授拈出“中国趣味”作为他新著的标题，是有他对中华文化的深入思考在其中的。纵观郭英德教授的研究，使人最有学术创获且能廓清沉霾之处，恰恰都在于作者一以贯之、不离不弃地对于中国趣味的探寻——这才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逻辑原点与最终归宿，也正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文化自信的起点。

本文作者：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左杨

**The System and Kernel of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A Review of Professor Guo Yingde's *An Exploration  
of the Chinese Taste***

*Li Xiaolong*

**Abstract:**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e study of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flourishes at the “technical” level but is faced with great difficulties at the “doctrinal” level. To solve this dilemma, we not only need to reconstruct the logic system of study of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but also need to examine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study in depth. Professor Guo Yingde's *An Exploration of the Chinese Taste* constructs a holistic system of Chinese ancient literary studies which is a quaternity of textual thickness, psychological depth, historical width and theoretical accuracy. And marking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the practical value of ancient literary studies with “the Chinese taste”, the book is a best attempt to resolve the aforementioned dilemma.

**Keywords:** the study of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system; Guo Yingde; the Chinese taste